主体性与美好生活

当代西方伦理学中的两种幸福路径研究

刘 科 / 著

A Study of Two Approches of Well Being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thics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非外借

本书从伦理学思想史呈现的两类明显不同的理论旨趣与思想进路出发，相对精确地反映了两种幸福路径融合互补的态势。两种幸福路径的融合互补体现在对三组关系的解释中，对于好生活的讨论通常有脆弱性与稳定性、后果与自由、福利目标与主体性（非福利）目标三种冲突。每组关系中的两者在当下均呈现“隐”“显”相交、此消彼长的趋势。本书由此探讨亚里士多德路径与功利主义路径在相互补充时对传统问题的创新性回应，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幸福生活所要求的伦理底限，提出建构良好秩序的道德储备，最终明确“可持续性”的幸福才代表当下的真实诉求与未来的发展方向。

A Study of
Two Approches
of Well Being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thics

上架建议：哲学 · 伦理学
ISBN 978-7-5520-4282-5
9 787552 042825
定价：88.00 元

主体性与美好生活

当代西方伦理学中的两种幸福路径研究

刘 科 / 著

AUTONOMY AND GOOD LIFE

A Study of
Two Approches
of Well Being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thics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体性与美好生活 ：当代西方伦理学中的两种幸福路径研究 / 刘科著 .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

ISBN 978-7-5520-4282-5

Ⅰ. ①主… Ⅱ. ①刘… Ⅲ. ①伦理学史—西方国家 Ⅳ. ①B82-091.956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249915 号

主体性与美好生活

——当代西方伦理学中的两种幸福路径研究

著　　者：刘　科
责任编辑：董汉玲
封面设计：杨晨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sassp@sassp.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万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72 千
版　　次：2023 年 12 月第 1 版　　202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4282-5/B・344　　定价：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受小女嘱托，让我为她这几年的一项研究成果写一篇序言。我与她的专业并不相同，这样作序颇有隔靴搔痒之感。但奈何小女言辞恳切，我便只能勉为其难，试着给她写这篇序言。

这是一部伦理学研究的专著，主书名为“主体性与美好生活”，副书名是“当代西方伦理学中的两种幸福路径研究”。一谈到幸福，中国人的观念里包含着“福气”与“圆满”一说，从传统文化看，幸福是一种内在的心境，而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幸福既然不是由外在的物质条件决定的，那么内心的和谐、宁静和自我实现感想来就很重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幸福是由身心健康、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社会地位、荣誉和智慧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人们追求这些，主要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平静、安宁和满足，而不是为了获得外在的物质财富。这种认识与古希腊的说法颇有相似之处。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和昔勒尼学派告诉人们要想摆脱痛苦，就要否认外在善的重要性，学会在内心深处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静。他们强调最大快乐是最终摆脱所有痛苦。伊壁鸠鲁的快乐论主张快乐既非低俗也非邪恶，而是与身体和精神的康健相联系，痛苦则与疾病相联系。世人在我们这个年纪尤感健康是最好的，在这个基础上的所有世俗快乐都是好的，即使有些快乐掺杂着痛苦或者导致痛苦，但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善。亚里士多德在外在的善和内在的善中曾指出，荣耀、名誉属于外在的善，因为它们有赖于他人的评价和给予。外在的尊重和倾慕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有价值的是本人赢得他人赞美或尊重的品性。而财产、权力和资源也属于外在的善，它们只有工具价值，只有当这些事物能转换为一个人获得幸福的手段

时才有意义。尽管用否定的方式指出上述这些都不是幸福本身，但亚里士多德还是坦言，比如朋友、财富和权力虽然非我们追求的终极之善，但就我们所获取的内在难以剥夺的幸福而言，它们也是一个人过欣欣向荣的生活的有效补充。

这些看似都是古今以来东西方皆以为然的道理，端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待问题。东方文化中屡屡谈心性，西学却也能把研究外在福利最终变为一门学问。在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经典里有“内圣外王”之说。所谓“内圣外王”是说内备圣人之至德，施之于外，则为王者之政。于是，人们通常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来追求幸福。修身指的是修养身心，使自己内心健康、平静；齐家指的是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治国指的是为国家（指诸侯国）做贡献；平天下（指的是更大的范围，即王朝，这里我们暂且把它译为社会）指的是为社会做贡献，使社会和谐美满。修身、齐家属于“内圣”，治国、平天下属于“外王”。能够做到这样，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从书中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开端的古希腊也谈美德与幸福，但到了近代和现代却逐渐从关心快乐发展出了一条通向财富、交换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问，纯粹谈德或福也不再是伦理学家的唯一兴趣。现代社会，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几乎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如果从经济谈道德、看人生活动、看社会发展动力，依我之见，大约是把“内圣”的主体性力量贯通于经济活动的“外王”之道，反过来也可以看经济与社会发展怎么样能够让众人的生活活跃起来，让一个个家庭安康幸福起来，这在当下是颇有意义的事情。

副标题“当代西方伦理学中的两种幸福路径研究”中的两种路径，其一是幸福与当代西方获取福利的制度活动研究，其二是幸福与西方人处世、齐家和安邦的智慧。面对两个貌似没有交集的路径，融合式的研究能更完整地理解我们现代“人”，也是有意识地、有倾向性地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多种范式放在中国的现实中进行有效审视。今年暑期女儿在广州出差，电话中与我谈到她有一个讲座，主题是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是宏大，如何谈当看主讲人的学科基础以及研究兴趣。关键是长期伏案工作做思想研究的人怎么能把这些理论性的东西实体化、生活化。大多听众还是喜欢听故事的，尤其是老百姓最喜欢的关系到身边利害得失的东西。我便说到中国现在实施福利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很不一样，人口基数、工资水平、社保支出与医疗

资源的分配，很多策略是有具体的地方需求以及固有路径依赖的，不是理论用于实践这么简单，是很艰难，也很不容易的。我的切实感受是，中国在努力做到老有所养，我们老年人还是有幸福和安全感的。我退休16年，我和老伴的养老金每年都在涨，在医保上，病有所医，打针、吃药、住院看病基本都有保障。今年8月，我因冠心病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院，所花费用医保报销了近80%。无论是女儿还是我们都对医疗这部分的保障关注更多，我们谈到三明医改，以及今年7、8月国家在医疗制度与改革上的重拳出击，从宏观上国家每年巨额的医疗支出，到中观的资源调配以及制度保障，再到微观落在老百姓身上的切实感受，近三十年来的情形都不断地变化改善。另外，在日常生活上，我们居住的社区周围有几条很热闹的小街，小街上有社区大食堂、老字号小吃，很有趣的是，这些店铺中午和下午最常见的就是吃饭、聚会的上海老人，饭食不仅可口宜人而且价格便宜，成为我们老年人消磨闲暇生活的好去处。这都使我们感到老有所依，至于说到西方人齐家和安邦的智慧，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当然也有与其媲美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智慧，女儿、女婿对我们孝顺关爱，外孙女也喜欢在家里跟老伴学做菜。一个家庭上慈下孝的模式，说到底，这些还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也是书中所谈“主体性”在社会生活中演绎自己人生故事的缩影，它们无不与社会变更、现代化的发展息息相关。

书中已经提到研究创新与贡献在于，当代社会科学有实证和定量的方法，但不过多思量价值前提，而哲学能阐明意义并具有伦理教化的职责，却没有描述精确的社会事件对其进行回应，因而融合研究并非为“融合”而融合，其用心在于兼顾社会科学对规律的说明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我非常认同这点，社会科学不应从狭义上理解，不应当被自然科学化，而应该包括对人的综合考虑，它其实包含着人文传统，一个人对历史、对当下诸多因素的价值评估和意义追求。代代人都在谈美好生活，也期盼美好生活，必须承认，它既是我们如今品尝到的成果，也仍然是未竟的事业。至此，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最后祝吾儿著书成功，成果丰硕。

刘晓明于上海寓所

2023年11月9日

目　录

序　言 …… 刘晓明　1

绪　论 …… 1

第一章　幸福与功利主义路径 …… 13

第一节　功利主义幸福观念的内涵与逻辑进路 …… 14

一、幸福与功利 …… 14

二、幸福与价值 …… 16

第二节　功利主义的三种幸福形态 …… 20

一、快乐论以及主观主义的历史渊源 …… 21

二、欲望满足理论及其向外在世界的探索 …… 27

三、客观列表理论与幸福的底限原则 …… 31

第三节　快乐论的当代辩护 …… 34

一、品味模式与感知模式 …… 35

三、快乐论对客观性与同质性的探求 …… 37

三、“善的制造者”问题 …… 41

第四节　功利主义幸福观念的优势与问题 …… 43

一、功利主义在幸福建构与幸福衡量上的优势 …… 43

二、功利主义幸福观念的实质困境 …… 47

本章小结 …… 53

第二章　幸福与亚里士多德路径 …… 55
第一节　目的论序列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图景 …… 56
一、目的论在当代是否还有意义 …… 56
二、亚里士多德提供的幸福图景 …… 58
三、亚里士多德思探求幸福的内在动力 …… 62
第二节　共同体主义与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底色 …… 65
一、麦金泰尔关于实践的内在利益 …… 66
二、自主性之于共同体的生活叙事 …… 70
三、实践智慧与当代幸福路径的规范性讨论 …… 72
第三节　后习俗视域下的亚里士多德路径与共同利益 …… 78
一、亚里士多德路径的当代应用与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 …… 78
二、作为美德的实践智慧与正确行动的关系 …… 82
三、美德对幸福生活的创造：从实践智慧到商谈 …… 84
本章小结 …… 88

第三章　幸福两种路径在当代问题中的融合 …… 90
第一节　脆弱性与稳定性的关系 …… 91
一、对不幸的关注：一种治疗哲学的态度 …… 92
二、对关系性的发掘：重新看待脆弱性 …… 95
三、脆弱性对幸福底限的诉求 …… 99
第二节　成就与自由的关系 …… 105
一、自由何以同福利成就产生冲突 …… 105
二、个人优势的四个维度 …… 106
三、自由：功能性活动与可行能力 …… 110
四、理性选择与可行能力方法应用的可行性 …… 114
第三节　福利目标与能动性目标的关系 …… 121
一、平等语境下能力方法的特质 …… 124
二、福利之外的目标导向 …… 126
三、个人视角的遗留问题及批评 …… 129
四、森的两难还是正义理论的两难 …… 132

第四节　从历史性维度考察幸福与正当性的对冲 …… 134
一、森对马克思理论方法的赞同 …… 135
二、认同和社会选择在幸福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 139
三、客观的幻象 …… 141
四、正义再分配 …… 145
本章小结 …… 150

第四章　幸福测量的综合性及当代发展范式的转变 …… 154
第一节　价值的不可通约与生活质量的可测量 …… 154
一、摆脱“测量的谬误” …… 155
二、不可通约与测量的可能性 …… 156
三、复杂系统中的判例诊断 …… 159
第二节　福祉测量的趋势：从幸福感到能力发展 …… 162
一、主观性幸福(SWB)的测量方式 …… 163
二、幸福路径(HA)与能力路径(CA)的交叉应用 …… 165
三、能力方法对福利经济学的影响 …… 170
第三节　美好生活的量化努力与人类发展指数 …… 173
一、人类发展指数的能力内核 …… 174
二、以商品为中心的指数(GDP)和以人为中心的指数(HDI) …… 176
三、人类发展指数揭示新问题与新趋势 …… 180
第四节　安全性构成对生活质量的重新评估 …… 184
一、功能运作的不安全与不可持续性 …… 185
二、劣势的动态聚集 …… 190
三、阻断劣势聚集与重新理解安全 …… 193
本章小结 …… 197

第五章　人类发展指数与生态的经济增效 …… 200
第一节　传统幸福测量在生态问题上暴露的缺陷 …… 200
一、发展的收缩与可持续性价值的出现 …… 201

二、美德伦理对功利主义关于幸福之“得”的批评 …… 203
第二节 绿色价值在功利主义与美德基础上的融通 …… 210
一、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在理路上的相似性 …… 211
二、功利主义原则的现实优势与美德的保障 …… 212
第三节 为生态的整体与未来所需要的美德策略 …… 214
一、功利主义与美德在行动中的匹配 …… 214
二、美德的独立性在于辨别伪善 …… 216
三、功利主义的绿色德性 …… 217
第四节 为生态的整体与未来求思的福利策略 …… 219
一、从线性到循环经济——一种新思维的诞生 …… 219
二、新观念在经济策略中逐渐实现赋权 …… 221
三、赋权的行动直面收入差距问题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 224
本章小结 …… 226

结 语 从马克思价值论看美好生活需要 …… 229
一、美好生活从认识需要出发 …… 229
二、何种需要优先 …… 235
三、谁之需要优先 …… 239
四、冲突的持存与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 243

参考文献 …… 248

后 记 …… 260

绪　论

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道德，它是对道德现象进行哲学反思的研究活动。但伦理学的根本目标也是为了质询生活的意义，它仍然关心着什么样的行为方式、生活形式和社会建制最能创造出美好的生活。如人们直观所见，在当代讨论伦理学，立刻映入眼帘的往往是那些关于道德规范与道德行动的基础性议题。显然，规范伦理学能够给出的道德劝导——如何获得普遍意义上的辩护，如何在说明具体规范时具有足够的解释力——这些问题更受当代伦理学重视。然而，这些主题面临的最大困境恰恰在于它们指望用规范阐释规范，而事实上任何规范的合理合情之处反而在规范之外的生活意义上，不关注好的生活，规范就会失去“根据”。

幸福何以成为伦理学的主题？这在古典的伦理语境中并不构成问题，因人的行为活动本就为这一种先定的目的而生，“美好生活”“幸福”和“生活意义”是三位一体的伦理学基本问题。但是古代目的论背后的未知力量及其神秘感很快随着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而被迅速祛除，现代生产、分配和传播的衍生推动了社会机制的日益发达，从而让人们的生活意义被利益掩盖，行动、利益和规范反倒把生活直接规划为一套盲目的机械行为。在当代，我们重新讨论幸福，不是要反对伦理规范和制度的程序合理性，它们是保证利益和生活的必要条件，而在于：任何制度和规范的合理性绝不能抛弃生活的理由，也就是伦理规范以及优质衍生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不能失去生活的本来目的。或者笔者愿意称之为生活的永恒事业，那就是每个人终其一生所要追求的构成幸福的事情，比如爱情、友谊、思想、审美和对公共事业的关怀等，甚至如罗素所说，我活

着是为了“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痛苦难以忍受的同情”。①

当代伦理学中那些更具规范性或者是法理学价值的核心概念，如自由、公正、平等等，是为了保证我们生活所处的世界与秩序的稳固，它们必须服务于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也罢、幸福也罢，当代伦理学尽管不是故意把它们作为遥远或隐而不发的理念，但事实上却把幸福狭隘化为一种比生活意义小得多的概念，比如快乐、效用等，也将自己的视野陷入因为量化了快乐和利益，从而投身于为此建立规则或正当性的种种社会观点之中。因此，笔者在本书中对当代伦理学在规范性和客观性上的努力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时刻保持警惕的是担心伦理学的规则讨论往往沦为一种讨好大众的社会策略，抑或是演变成毫无情感精神的效用式的行动攻略。本书的副标题“当代西方幸福理论的两种路径及其融合”，既旨在暴露当代西方伦理学的这种探寻规范性并把幸福压缩为狭义目标物的趋向，也希望将人们的目光重新拉回到生活世界，以生活看社会、以生活之意义看当代人重视规范性和普遍性的积极努力。

尽管当代伦理学更关注正当性所代表的“应当”，而非对幸福生活何为的终极论证和辩护，但重新提起幸福必然要包含从规范视角来考虑幸福的可能性。规范从来不只是对我们的劝导和诫命，但它们却是人们思索生活品质及其可能性时无法回避的重要维度。一方面，在过去的 50 年，美德伦理的复兴曾以不可抵挡之势批判了现代道德哲学关于规范性和普遍性的种种困境，以及现代道德规范背后那些错误的预设和日渐背离生活世界的狭隘策略，至善之思仍是伦理学考察人生与社会的共同诉求；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德伦理的复兴从未谋划取代伦理学探求规范性建构的努力。随着伦理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幸福视野汇聚越来越多的理论优势：以幸福为目的推动着传统德性论与规范性道德的和解，从幸福总量看社会整体与未来为导向的系统性思维方式，以及基于幸福测量发掘经验性与实证的强大解释力度。这些当代变化都不约而同地让人们认识到，幸福不是一个仅仅谓之以生活热情的鸡汤式话题，而是需要关注具体的实践规律，关注社会公共政策、经济秩序建构的合法基础，尤其是关注制度的规范性与具体情境之契合的动态思考。由此幸福建基

① Bertrand Russell,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George Allen and Unwin: Boston and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Vol. 1, 1967.

于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同时既注重规范性的重构，更强调主体对幸福与道德规范之间关系的恰当认知，这些使现代伦理学所讨论的幸福问题有了新的价值内涵。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无疑是德性幸福论的最伟大代表，幸福成为伦理学最基本的关注就在西方伦理学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把幸福作为伦理学的最高追求。经过多年演变，当代西方伦理学最终呈现为功利主义、义务论与德性伦理三种理论类型。按照研究者的不同理解，幸福被称为内在的善、至善、最高的善或各种善的集合等。古希腊的幸福（eudaimonia）概念也由此被当代学者分别理解为 happiness 或 well-being，甚至是 happiness 与 well-being 的结合。[①] 例如，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就提醒道，人们在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翻译中把“幸福”一词用 happiness 来表示其实不妥，[②]亚里士多德的 eudaimonia 在英语中并不具有类似的当代含义。W. D. 罗斯（W. D. Ross）建议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概念翻译成“well-being”（尽管事实上他在牛津版《伦理学》中还是坚持用了 happiness，我们的中文标题也依然使用“幸福”这一比较常见的用法）；[③]约翰·库珀（John Cooper）曾经提出用“繁荣（flourishing）”来表达亚里士多德的含义，[④]这在后来纳斯鲍姆的论著中汉语翻译往往用了“欣欣向荣”一词。其实学界通常赋予 eudaimonia 一个实质性的含义，使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尽可能不同于日常道德直觉对幸福的理解。如果说日常幸福表现在达到某种主观标准，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则是要达到某些客观性的指标，而且要具备一种身在其中的心灵状态，它是一个人不断成长而逐渐趋于内在与外在的共同繁盛。

幸福的讨论逐渐演变呈现出很多理论分支，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了古希腊

---

① Kraut, Richard, “Two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88, No. 2 (Apr., 1979), pp. 167 - 197.

② Sidgwick, Henry, *The Methods of Ethics*, 7th edn., London, 1907, pp. 92 - 93. 引自 Kraut, Richard, “Two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88, No. 2 (Apr., 1979), pp. 167 - 197。

③ Aristotle, *A Complete Exposition of His Works and Thought*, Meridian edn., Cleveland, 1959, p. 186. 除非特别说明，英文学界一般都使用罗斯的翻译。

④ Cooper, John, *Reason and Human Good in Aristotl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p. 89 - 90, n. 1. 库珀说“幸福”并不是一个好的翻译，亚里士多德关于 eudaimonia 的说法显然不符合通常理解的幸福。比如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 1100al - 4 中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只有当孩子成年后能够达到 eudaimonia 时，才能被称为 eudaimon。

的德性幸福论传统，以幸福是个人完善生活的实现作为阐述当代幸福理论的一种主要路径。同时功利主义伦理学主张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它对幸福的理解构成了当代幸福理论的另一种主要路径。此外，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虽然以道德来拒斥或超越幸福，但它对道德与幸福关系的思考却是幸福理论所必须处理的问题，也是功利主义与德性论这两条当代幸福理论路径的重要内容。

英文世界对幸福观念的研究颇为丰富，国外近年来代表性论著有：(1) 综合性的研究：牛津大学的詹姆斯·格里芬(James Griffin)对幸福理论的上述四个方面都进行了详尽分析。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对幸福概念的古今演变和争论焦点做了全面的梳理。(2) 对幸福功利主义路径的研究：加拿大学者 L. W. 萨姆纳(L. W. Sumner)在《福利、幸福与伦理学》中主张在关注人的真实性和能动性的基础上发展一种更好的主观主义幸福论。牛津大学的罗杰·克里斯普(Roger Crisp)在《理由与善》(2006)中对享乐主义进行了深度辩护，他指出主观感受具有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善”的优越性，已经具有了客观的同一性。D. 卡纳曼(D. Kahneman)的《幸福：享乐主义心理学的基础》(1999)通过情感和知觉价值等心理学表现论述了主观状态与幸福之间的关联，揭示了财富和幸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幸福悖论”的缘由。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在《人类满意度与公共政策》中提出收入和幸福视角之间的关系，解释经济繁荣与快乐之间的非必然性问题。理查德·克劳特(Richard Kraut)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提出对两种幸福概念的区分，他主张学界应抛开亚里士多德客观幸福的传统理论，转而注重日常幸福的主观感受。(3) 对幸福德性论路径的研究：朱丽叶·安娜斯(Julia Anns)在《幸福的道德》(1993)中主张美好生活基于稳定客观的品德和环境，古典的和谐的幸福视角是对道德规范、利他行为最好的解释。保罗·布鲁姆费尔德(Paul Bloomfield)在《幸福的德性：一种美好生活理论》(2014)中认为道德不仅为证明行为的正当，其本质是导向一种值得过的美好生活，他根据涉己和涉他两方面论证了它们在幸福范畴中能够有效地整合起来。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与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合著的《生活质量》提出了美好生活是自身不断发展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是基于人的可行能力以及各种客观因素，它们还被应用到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上。纳斯鲍姆

致力于把森的可行能力方法融入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去，她进一步提出了“人类基本能力清单”。(4) 还有一部分学者专门研究幸福的人际比较，即幸福的衡量及意义。R. 苏格登(R. Sugden)在《福利、资源和能力》(1993)中指出，在获取幸福的过程中运用能力方法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有效理论。乔恩·埃尔斯特和约翰·罗默在《幸福的人际比较》中思考人际幸福比较是否有意义和价值，人际比较能否在理想条件下得到实际执行，以及人际比较的现实执行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幸福本身。蒂姆·洛玛斯(Tim Lomas)在《幸福的翻译：幸福的跨文化词汇》(2018)中又提出一种创新的幸福比较研究法，他介绍了一种“语言制图理论”用来导航幸福生活的方法，即运用语言学、心理学跨学科方法对几十种语言中的幸福语词进行细分，指出在不同文化中有三种元类别——情感、关系和个人发展——共同构成了一种幸福衡量的框架。

总体而论，西方幸福理论渊源已久，但当代对幸福研究的理论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跨学科的趋势，近年来，随着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幸福的功利主义路径更关注人们体验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寻求更精准的幸福测量依据。而幸福的德性论路径则侧重人们生活的完整性，并通过幸福来考察以正当为主的规范伦理的转变。从当前来看，幸福的内涵、幸福与道德重要性、幸福与价值评判，以及幸福能否成为伦理学的核心等问题仍是目前英美讨论的热点，而两种幸福路径包容共进的发展趋势刚刚崭露头角，尚未形成一个与之具有的社会重要性相匹配的系统全景。

中文世界对幸福理论展开的研究也更多涌现出来。幸福理论的国内研究代表作主要如下：江畅在 1999 年出版《幸福之路：伦理学启示录》，奠定了德性论为基础的幸福主义伦理学。江畅在借鉴了后现代对现代西方价值观的批评后，在幸福理论中引入责任、环保、和谐、智慧等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走向优雅生存：21 世纪中国社会价值选择研究》(2004)以及《幸福与和谐》(2005)，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幸福论体系。陈泽环在《道德结构与伦理学》(2009)中以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三维异质道德要素为背景论证个人德性维度之于幸福的内生价值。贺来的《有尊严的幸福何以可能》在人作为价值主体而非工具的意义上阐发了“自由”“正义”是尊严的重要前提，尊严构成了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此外，从功利主义伦理学讨论美好生活的价值

观念，以及从功利主义出发的经济学视角对福祉与社会公平的相关讨论在近年逐渐扩展为有关幸福主题的跨学科研究。龚群在2002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研究》以及2021年出版的《当代后果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中介绍分析了当代西方功利主义发展前沿对幸福以及内在价值的探讨。傅红春的《两种幸福悖论：收入悖论和欲望悖论》(2014)论证了幸福两种计算公式在经济学框架内统一的可能性。他的《经济学与幸福》《幸福经济学选读》对当代国外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立论做了清晰的归纳梳理。青年学者王葎的《幸福与德性：启蒙传统的现代价值意蕴》(2014)主要讨论了卢梭、康德以来的理性启蒙如何尝试讨论德福一致。任付新在《对密尔"快乐"概念的亚里士多德式解读》中指出密尔虽然主张幸福即快乐，但他以更接近亚里士多德的方式重建了快乐的内涵。孙尚诚在《基于最大幸福的最优公正》中从功利主义的边际分析讨论追求最大幸福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此外，还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阐释幸福的神经机制，彭凯平等人在《幸福科学：问题、探索意义及展望》(2014)中展示了幸福对于健康、创造性和生产力以及社会发展促进的实证研究。

概言之，国内对于幸福的德性论路径的研究较为成熟，近年来幸福的功利主义路径的讨论主要凸显在经济伦理学中，当然伦理学与福利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跨学科研究中美好生活都以具体问题的形态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而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幸福研究通常呈现出两类明显不同的理论旨趣与进路，但梳理与归纳的研究工作尚未完全展开，这两种路径在演变中彼此影响从而构成对当代学界新问题、新趋向的解释。因此，我们希望对当代西方幸福理论两种路径的形成、发展、趋势及意义有待整体的理解和把握。

当代幸福理论的两种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三十年来西方社会治理路径的改变、社会发展范式的转型，就当前西方主流发展理念与新萌发的思想理念间的抵牾而言，决策者对幸福的两种路径探讨的取舍与拿捏可以算是这一理论动向的现实体现。生活之善是一个笼统的表达，但幸福既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同时也通过经济学的分支福利经济学的测量指标反映着一国的幸福生活水准。因而本书研究的两种路径不仅呈现了伦理学幸福概念的结构框架，也将指出当代伦理学的讨论在实践上促成了当代人测量幸福生活的指标变化的理论依据，甚至是当前以及未来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方向与价值预测，